

黑色

系列

014

血与水

〔美〕伊恩·考德威尔 著 陈杰 译

IAN CALDWELL
THE FIFTH GOSPEL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黑色
系列
014

血与水

〔美〕伊恩·考德威尔 著
陈杰 译

IAN CALDWELL
THE FIFTH GOSPEL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9253

THE FIFTH GOSPEL

by Ian Caldwell

Copyright © Ian Caldwell, 2015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与水 / (美) 伊恩·考德威尔著; 陈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黑色系列)

ISBN 978-7-02-013832-6

I. ①血… II. ①伊…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132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李 晖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32-6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伊恩·考德威尔

IAN CALDWELL

美国作家，擅长写作历史题材推理作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曾是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学会会员。伊恩与好友达斯汀于一九九八年大学毕业时开始联手创作长篇小说处女作《四法则》，历时六年完成，自此一炮而红，跻身超级畅销小说作家之列。《血与水》是作者的最新作品。

黑色系列·第三辑

012《坏种子》

[美]哈里·多兰 著 蓝 澜 译

013《梦景之眼》

[英]萨曼莎·香农 著 沈丽凝 译

014《血与水》

[美]伊恩·考德威尔 著 陈 杰 译



责任编辑：甘 慧 李 晖

封面设计：汪佳诗

封面绘图：陈大欣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99网上书城(www.99read.com)有售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背景

两千多年以前，有对兄弟从耶稣诞生地出发，到各处宣讲教义。使徒彼得到了罗马，成了西方基督教的象征性创始人。使徒安德烈到了希腊，成了东方基督教的象征性创始人。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他们创建的教会是统一的。但一千年之前，东西方的基督教发生了分裂。使徒彼得的继承者成立了天主教，使徒安德烈和其他一些东方基督教长老的继承者成立了东正教。现在，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地球上基督教最大的两个教派。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支拥护教宗却保持东方礼仪的东仪天主教。

小说发生的背景设置于二〇〇四年。这一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病入膏肓，最后的愿望是要将天主教和东正教重归一统。小说描写了兄弟俩的故事，一个是天主教神父，一个是东仪天主教神父。

前言

我的儿子彼得年纪太小，还不明白宽恕是什么意思。大城市罗马的生活让他认为宽恕很简单：互不相识的人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忏悔窗前排成几队，依次走到窗前向神父告解。忏悔室顶上的红灯时而闪亮，时而熄灭。红灯的熄灭意味着神父已经听完一个忏悔者的告解，准备接待下一位。看到这个场景，我儿子就想，道德心同卧室和盘子没什么两样，擦擦就能干净。因此，当彼得开着洗澡水一直不关，把玩具随地乱丢，一裤子泥巴从学校回家时，他就开口要求得到宽恕。他像教宗开口致以祝福一样随意张口道歉。两年以前，他理直气壮地做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忏悔。

小孩子不懂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过犯，什么又是饶恕。神父可以很快地宽恕一个陌生的忏悔者，但孩子不可能预料到，将来饶恕敌人抑或是他所爱的人会有多么难。他不会想到，品行端正的人有时甚至无法原谅他们自己。糟糕的错误可以被原谅，但难以一笔勾销。我希望儿子永远不要和罪恶搭上边，别像我和哥哥那样在罪恶中陷得那么深。

我生来注定会是一个神父。舅舅是个神父，哥哥西门也是个神父，我希望彼得将来也能当上神父。从记事起，我就一直住在梵蒂冈。彼得和我一样，也一直住在梵蒂冈。

世人对梵蒂冈有两种印象。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梵蒂冈是艺术的殿堂，是汇集了天主教精粹的博物馆。但同时这里也是天主教教义的宣讲地，成千上万的年迈神父在这里挥舞着指头宣传教义。孩子们似乎很难在反差如此之大的地方顺利成长。但梵蒂冈却到处都有孩子：教会的园丁有孩子，教会的工匠有孩子，教会的瑞士卫兵也有孩子。孩子们在花园里捉迷藏，和祭坛助手一起踢足球，在大教堂的圣器收集室玩弹珠。而有时他们也会不情愿地跟着母亲去超市和百货商店买东西，和父亲去加油站和银行办事。梵蒂冈和高尔夫球场差不多大，我们却和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样充分享受到了童年的乐趣。我和西门健康快乐地成长，除了父亲是个神

父以外，我们和别的梵蒂冈孩子没什么两样。

爸爸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而是一个东仪天主教的神父。他留着一口长胡子，长袍也和天主教会的神父完全不同。他不做弥撒，做的是东仪天主教会的礼拜仪式。他可以在成为神父之前婚配。他常说东仪天主教是上帝的使节，是把天主教和东正教重新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事实上，东仪天主教的教徒却像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难民似的，感受着双方的敌意。父亲总在试图隐藏着背负在身上的重担。地球上有十亿天主教徒，东仪天主教徒却只有几千人，在梵蒂冈这个被独身者统治的国家，结了婚的神父只有父亲一人。梵蒂冈的神父瞧不起我父亲，我父亲和他们也井水不犯河水。直到生命快到末了时父亲才褒奖性地得到了一次升职。

父亲死后没多久母亲就死了。医生说母亲死于癌症。但医生不知道，母亲是因为少了依托而死的。父母相识在看对眼就能走到一起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认识以后，他们常常一起在父亲的公寓里跳舞。度过了一段背离上帝的日子以后，他们开始虔诚地对上帝进行祈祷。妈妈出生在罗马天主教家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家为梵蒂冈教会贡献了许多神父。嫁给留胡子的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后，妈妈的家人就和她脱离了关系。爸爸死后，妈妈说没有人能再让她抱了，空有一双手让她感到很奇怪。我和西门在梵蒂冈教区教堂后父亲的墓旁安葬了她。那以后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自己日复一日地旷课，双手抱膝坐在墓旁痛哭。每当这时，西门总会过来把我带回家。

母亲死的时候我和西门都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因此我们被送到在梵蒂冈当枢机主教¹的舅舅那里寄养。卢西奥舅舅不通人情，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作为梵蒂冈的财政总管，他的任务是平衡国家预算，防止教会的雇员成立工会。从经济的角度上讲，他反对推行对生育进行奖励的政策。即便有时间抚养姐姐的遗孤，他也许都不会抚养。因此当我和西门打算回到父母的公寓自己养活自己时，他什么都没说就放我们走了。

我年纪太小，养活不了自己。西门只得大学休学一年，找了份工作。

1 天主教教宗治理教会的主要助手与顾问，由教宗亲自任命，是天主教各级神职人员中仅次于教宗的职位。

我们不会做饭，不会缝纫，不会修理浴室，西门只能自己琢磨，把这些全都学会。他每天叫我起床上学，临走时给我吃中饭的钱。他让我吃饱穿暖，衣食无忧。我从他那儿学到了祭坛助手所应掌握的全部知识。笃信天主教的孩子总有那么几天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值得上帝用尘土造出现在的样式，并为此而在黑暗中睡不着觉。但上帝在黑暗中、在生命中为我遣来了西门。他一夜之间突然成熟了，护着我把我养大。我欠西门太多，除非他愿意免除，否则我一辈子都难以偿还。有什么能为他去做，我都愿意为他去做。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第一章

“西门伯伯还没到吗？”彼得问我。

家里的女管家海伦娜修女在煎着平底锅里的鳕鱼时，必定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西门已经晚了十来分钟了。

“别介意，”我说，“来帮我整理桌子吧。”

彼得没理我。他爬到椅子上跪下来，自豪地对我高声宣布：“我和西门伯伯先去看场电影，接着我带他去罗马动物园看大象，最后他还会教我马赛回旋。”

海伦娜修女在平底锅前轻飘飘地走了两步，她想必是把马赛回旋当作是一种舞步了。彼得不乐意了。他举起一只手，做出巫师念咒的姿势说：“不是跳舞，是足球场上的控球动作，罗纳尔多做这个最在行了。”

西门从土耳其到罗马观看我们共同的朋友乌戈·诺格拉举办的展览。要不是给诺格拉帮忙，我肯定无法搞到大约一周以后的开幕晚会的门票。但彼得可不管什么展览，他和西门在这里一起住了五年之久，一心只想着让西门教他踢足球。

“世界上比踢球重要的事情可多着呢。”海伦娜修女说。

海伦娜修女刻意用女性的理性嗓音说。彼得十一个月大的时候，我妻子莫娜离开了我们。从那以后，这位年长的修女成了我们的生命支柱。海伦娜修女是卢西奥舅舅可以随意支配的众修女中的一个，卢西奥舅舅负责她的日用开支。很难想象，没有她我们会怎么样，一般保姆要求的工资我肯定是开不起的。幸运的是，海伦娜修女绝不会把彼得一个人抛下。

彼得钻进卧室，很快便拿着妈妈送的数码闹钟出来了。他把莫娜送给他让他守时的闹钟放在桌子上，指着钟面上的数字让我们看。

“小乖乖，”海伦娜对他说，“西门神父坐的火车也许晚点了。”

海伦娜修女的这一招很妙。她向彼得指出，是火车，而不是西门个人的原因让他迟到了。彼得很难理解，西门这样的大人怎么会时常忘了带车

票钱或是忘了时间，只顾着和陌生人一起侃大山。因为秉性难测，莫娜甚至不同意用他的名字为我们的孩子命名。尽管西门得到了年轻神父所能得到的最尊贵的工作——教廷的驻外使节——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份十分劳心劳力的工作。和母亲这边的家人一样，西门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这意味着他不能结婚，也永远不会有孩子。和梵蒂冈众多安守一地、大腹便便的神父不同，西门的个性很不安分。为孩子命名的时候，莫娜希望他像我这个不紧不慢、容易自我满足的父亲。最后，莫娜做了妥协，同意给新生儿命名彼得：在福音书中，耶稣给一个渔夫起名西门，后来又叫他彼得。

我拿出手机，给西门发了条短信——快到了吗？——彼得则一直盯着海伦娜平底锅里的食物。

“鲑鱼是种鱼。”彼得嫌弃地说。他正巧在学着给东西分类的年龄，他不爱吃鱼。

“西门喜欢吃鱼，”我告诉彼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吃鱼。”

事实上，我和西门小时候经常吃的是银鲑鱼，而不是平底锅里这种鱼肉难吃的黑鲑鱼。神父的薪水只能在市场上买这种黑鲑鱼吃。莫娜总会在准备一大家人吃饭的时候提醒我，比大多数梵蒂冈神父都高出一个头的西门能吃掉两个正常人才能吃掉的东西。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想起莫娜。西门的到来似乎总能勾起我对妻子离去的回忆。他们是我生命的两极：看到一个总能使我想起另一个。我和莫娜自小在梵蒂冈的高墙内一起长大。在罗马再次相遇以后，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但我和莫娜有很多问题——东仪天主教的神父必须在被授予圣职前结婚，不然就永远结不了婚——回想起来，莫娜那时还没有完全为结婚准备好。在梵蒂冈做人老婆并不容易，做神父的妻子就更难了。莫娜生产前一直在上班，生出来的蓝眼婴儿却吃得多，睡得少。尽管不断往冰箱里加食物，但因为婴儿一天要吃很多顿，所以冰箱里总是空的。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真相。冰箱里空空如也是由于莫娜不再去百货店了。我之所以没发现，则是那段时间她也不怎么吃饭的缘故。她不再祈祷，不再为彼得唱歌。彼得一岁生日的三周前，莫娜突然消失了。我在壁橱后的枕头下发现了一瓶药。梵蒂冈医疗服务中心的医生告诉我，莫娜一

直在尝试着走出抑郁。医生让我们别放弃希望，因此我和彼得一直在等她回来。我们等了又等，一直等到了现在。

今天，彼得告诉我他还记得莫娜。当然，这些记忆只是从公寓各处的照片中剪接出来的。彼得用自己从电视节目和杂志广告中获得的知识为莫娜的照片着色。他没发现，东仪天主教的女人平时不施粉黛，不抹口红。他对天主教的了解几乎全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在他眼里，我只是个离群索居，不善交际的神父。他的年龄太小，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矛盾之处。但他常把莫娜放在自己的祷告里，有人告诉我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幼年丧母之后也经常这样祷告。这么一想，我又感觉到了些许的安慰。

电话终于响了。在我匆忙赶过去接的时候，海伦娜修女的脸上展开了笑颜。

“你好。”我对着话筒说。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

我原本以为能在电话里听到地铁站或机场的声音。但话筒里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声音。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似乎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是你吗？”我问。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几乎没做出反应。我想西门应该离家很近了，梵蒂冈的电话信号总是非常弱。

“阿列克斯。”他在电话里说。

“你怎么了？”

他又说话了，但电话线里的杂音很大。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去探望临近布展结束面临巨大压力的乌戈·诺格拉去了。但我不会把这个想法告诉彼得，不然彼得一定会觉得伯伯丢下他，去照管别的什么人去了。

“你在博物馆吗？”我问他。

餐桌旁的彼得坐不住了。“他和诺格拉先生在一起吗？”彼得轻声问海伦娜修女。

电话线那头的情况似乎有了变化。我听到一阵如同风声的嘶嘶作响声。他现在正身处户外。外面的风声很大，至少他已经到了罗马。

过了一会儿，电话线里的杂音小了。

“阿列克斯，我要你来接我。”

他的声音颤抖着，我背上的寒毛一根根竖了起来。

“怎么回事？”我问他。

“我在冈多菲堡¹的花园里。”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去了冈多菲堡？”

风声又出现了。听筒里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声音，西门似乎在低声呜咽。

“阿列克斯，求你了，”他说，“你快来吧。我在——我在别墅的东门附近。你最好能在警察赶来之前到达这里。”

彼得呆呆地瞪着我。纸巾从他的膝盖上掉落下来，像教宗的白色便帽一样在空中飞舞。海伦娜修女也在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待在那儿别动。”我告诉西门。我转过身，不让彼得看到我的眼神。我从哥哥的声音里听到了从没听见过的恐惧。

1 教宗的夏季别墅。

第二章

在呼啸的北风中，我驱车前往冈多菲堡。雨很大，鹅卵石路面上的雨点像跳蚤一样蹦蹦跳跳。车开到高速公路时，雨刮像击鼓棒一样不停地向两边划水。四周的车慢慢减速，停在紧急停车道上。示意禁止行驶的红灯灭了以后，我的思绪又转回到哥哥身上。

小时候，西门是个敢于在打雷时爬树营救迷路小猫的孩子。在坎帕尼亚的海滩，我曾看见他跳进满是水母的大海，从波涛汹涌的海水中救出一位姑娘。那年冬天，他十五岁，我十一岁，我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器收藏室去探望作为祭坛助手的他。他本要带我在罗马理个发，但就在我们要走出长方形会堂的时候，一只鸽子飞过两百英尺高的教堂的圆顶窗户，在天台的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西门想上去瞧瞧，因此我们登了许多级台阶，登上大理石会堂顶的弹丸之地。天台呈圆形，只有一道栏杆。鸽子躺在大理石地板上，不断扑扇着翅膀，咳出深红色的鲜血。西门走上前，用手捧起鸽子。这时有人突然大声喊，站住！别再靠近了！

天台另一头的栏杆边站着一个男人。他两眼充血地瞪着我。西门突然朝他冲了过去。

先生，别！他大喊，别再靠近了！

男人把腿跨过栏杆。

先生！

西门没长翅膀，无法及时赶到栏杆那里。男人往前一倒，手放开栏杆。我们看着他像根别针一样往圣彼得大教堂里掉了下去。教堂里有个导游正在向游客介绍说，“这是从万神殿偷来的铜器”，男人仍然在下坠过程中，这时在我们眼中已经比细线更小了。很快，教堂里传出一阵尖叫，教堂的地板上出现了点点血迹。我瘫坐在地，脚上的关节完全不能动了。西门只得把我从地上撑了起来。

我一直没明白上帝为何让一只鸽子飞过那扇窗，或许是想让西门了解

痛失所爱的感觉吧。第二年我们的父亲死了，由此看来，这一课非常重要。但那天留在我心中的最后一个画面，却是西门在工人们把所有人赶出教堂之前伸出双手，定定地站在咫尺见方的天台上，如同把花瓶放回书架那样想把鸽子放飞到天空中的模样。

和每次朝圣者跳楼自尽时一样，那天下午，神父们清洁了圣彼得大教堂。但没人能驱散孩子心头的阴影。两星期以后，唱诗班的指挥因为一个男孩唱赞美诗时跑调而刮了他的耳光，西门马上从队伍里跑出来，冲着指挥就是一个耳光。其后的三天，唱诗班取消了演出，父母一直逼迫西门道歉。西门说他宁愿退出唱诗班也不道歉。事后想来，这件事决定了我今后成长为怎样的一个人。从那时起，我对西门的看法就再没有改变过。

从上大学到在意大利开始接受艰苦的外交培训之间的整整十年，是锤炼西门心志的十年。孩童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和暗杀变得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潮汹涌的示威和游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公职人员统治的不敷出的政府。上大学期间，西门和许多同学一起上街进行反政府的游行。上神学院时，他和工人们一起游行过。担任教廷的外交官以后，我想这种事情应该再也不会发生了吧。三年前的二〇〇一年五月，约翰·保罗二世决定出访希腊。

这是十三个世纪以来教宗对我们故乡的首次出访，但希腊人却并不是很欢迎他。大多数希腊人信东正教，约翰·保罗二世希望通过这次出访结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状态。西门前往希腊，想看到两边教会化干戈为玉帛的一幕。但他不明白仇恨的力量，和父亲一样，他对历史上这两个教派为什么分裂也非常无知。东正教徒责怪天主教徒在从十字军东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所有战事中凌虐他们；责怪天主教徒诱惑他们脱离古老教会，加入混杂了其他种种异端的天主教。东仪天主教的存在对一些东正教徒来说是种挑战，但西门就是不明白为何他弟弟我，一个东仪天主教的神父，为什么不肯和他去希腊走那么一趟。

麻烦在西门踏上希腊的土地之前就来了。约翰·保罗二世来访的消息传到希腊以后，东正教的教堂就敲起了丧钟。成百上千的东正教教徒打着“打倒异教徒”以及“赶走双角罗马怪兽”的标语走上街头。报纸上刊登

了罗马天主教会挑起流血战争的陈年往事。政府指定那一天为全国性的哀悼日。西门原打算在父亲过去教区的教堂住下，到那儿才发现东正教的顽固派势力已经在教堂的门上喷满了涂鸦。西门说警察根本不愿出手相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他保护的落难者是什么感受。

那天晚上，一小撮东正教强硬分子闯进教堂，破坏了正在进行的圣餐仪式。他们剥去神父穿的长袍，脚踏圣坛上放有先圣遗物的圣髑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

西门身高几乎快到一米九。一想到自己比遇到的人强壮，他就会不自觉地帮助弱者和需要帮助者。西门依稀记得，为了帮助圣坛上的神父，他把一个破坏者推出了教堂。这个东正教徒控诉西门把他摔在地上。希腊警察说他打断了这个人的胳膊。西门被捕了。他所属的教廷事务管理局只得通过协调让他先期返回了罗马。因为这件事，西门没能亲眼目睹约翰·保罗二世成功化解希腊教徒敌意的一幕。

希腊的主教们决定当众斥责约翰·保罗二世，约翰·保罗二世没有抱怨。他们对他进行肆意侮辱，他不反抗也不辩解。他们要他对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犯下的罪行进行道歉，约翰·保罗二世代表十亿天主教徒以及数不清的天主教亡故者进行了道歉。东正教徒非常惊奇，最终答应了做他们一直拒绝的事情：祷告时站在约翰·保罗二世身旁。

我一直希望约翰·保罗二世在希腊的表现能对西门的操守起示范作用，成为天主给他的另一个启示。从那时起，西门应该变了一个人。在从罗马向南驶入风暴中心时，我一遍一遍地这样告诉着自己。

远处冈多菲堡映入眼帘：冈多菲堡的地界包括从罗马市郊延绵向南的高尔夫球场和旧车场上方起伏的大块山地。两千年前，这里是达官贵人的游乐场。教宗们虽然仅仅在这里消夏了几个世纪，却足以使这里成为梵蒂冈的延伸。

当车绕着山地行驶时，我在山崖下看见了一辆意大利巡警的巡逻车——意大利警察越过边境，正在暴风雨呼啸下的警车内抽烟。好在意大利警察在我要去的地方并没有执法权，梵蒂冈警察似乎还没冒着大雨赶

来，我那抽紧的心略微放松了一点。

我把菲亚特停在小山和阿尔巴诺湖交接的地方。走进暴风雨之前，我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第五声铃响过后，电话那头出现了沙哑的声音。

“找谁？”

“小圭多在吗？”

他哼了一声。“你是谁啊？”

“我是阿列克斯·安德鲁。”

圭多·加纳利是一个汽轮机工程师的儿子，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在这个得靠亲友关系才能找到工作的国家，圭多只能靠在山顶教会的奶牛场铲牛粪才能勉强谋生。他经常找一些干零活的机会。尽管我们不太有交集，但这次我必须找他帮忙。

“别叫我小圭多，”他说，“我爸去年就死了。”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每个人都是经历了这些才渐渐成人的。对了，你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吗？”

“我进了城，想找你帮我一个忙。能替我开下门吗？”

从圭多惊奇的语调中，我发现他还不知道西门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谈好了价钱：圭多知道我能从卢西奥舅舅那里弄来诺格拉展览的门票，于是问我要了两张门票。梵蒂冈的所有人都想看看我朋友乌戈取得了哪些成就。挂上电话以后，我沿着黑暗的小路开车驶向和圭多约定会面的地方，风声逐渐尖细成我从西门电话里听到的嘶嘶声。

很奇怪，这里一点没出事的迹象，我稍微松了口气。我有好几次从警察那里把哥哥领回家的经历，那几次，他无一例外地惹上了麻烦。但这里没有陷入纠纷的农民，也没有要求增加工资的教会雇工。从北面往南看，教宗的夏季行宫非常荒凉。梵蒂冈天文台的双穹顶像彼得兔突出的眼睛一样突兀。这里连个活物都很难找到，应该没有什么情况。

一条小道从宅邸通向教宗的花园，花园门口的一团黑雾中闪现着几点烟火。

“是圭多吗？”